

高校思想改造運動及其前後(1949-1952)：

以南京大學為中心的考察*

曾冠傑**

1950年代初期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對中共建政以後的高等學校影響深遠。本文以南京大學作為個案，研究高校思想改造運動的意義。首先，在歷史檔案尚未開放的前提下，盡可能考察這次政治運動的細節；其次，有學者認為高校院系調整工作的完成，表示高校思想改造運動的結束，本文認為兩者有某種程度的關聯，但高校思想改造運動與中共的組織清理有密切關係，所以思想改造運動的最後一步，應該是政治工作制度建立，並藉此把思想改造運動的「政治學習」與「思想檢查」加以常態化。

* 筆者於2009年2月至7月間至南京大學當交換學生，感謝當地師友在本文寫作初期的諸多協助與建議。另，筆者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之「第六屆冷戰時期海峽兩岸歷史研究生工作坊」(2009年10月2日)報告本文初稿，承蒙評論人陳耀煌教授提供的寶貴意見，以及《政大史粹》兩位匿名審查者的指正，在此一併致謝，惟一切文責仍由筆者自負。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airiti

· 100 · 曾冠傑

政大史粹第十八期

關鍵詞：高校思想改造運動、南京大學、院系調整、組織清理、
政治工作制度

一、前言

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始自1951年9月北京、天津地區高校教師的思想改造運動，之後擴大成為全國性的政治運動¹，對中共建政以後的高等學校影響相當巨大而深遠，是「新中國成立以後第一次系統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政治教育運動」²。而南京大學的前身，是民國時期有「首都大學」之稱的中央大學，本文以南京大學作為個案，希望進一步考察高校思想改造運動的意義。

《南京大學百年史》第七章「從接管更名到院系調整(1949-1952)」，有「思想改造運動」一節，篇幅不多，說明也相當簡略：「1952年3月，按照華東教育部的部署，全校師生員工3700餘人參加了思想改造運動。這次學習運動旨在幫助知識份子在政治上畫清敵我界限，在思想上肅清資本主義和封建買辦思想的影響，在思想方法上克服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扭轉脫離實際、學用脫節的傾向，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新的世界觀……」³。《南京大學百年史》是南京大學出版的校史專著，該節從1949年5月的「政治學習」談到1952年3月「思想改造」，無疑是有歷史眼光的，因為思想改造運動不是單一事件，而是一連串政治運動的一個環節。但該書對於這次運動的前因後果缺乏解釋，還需要梳理與中共的「組織清理」，以及1952年高校「院系調整」的關係，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思想改造運動的過程與內涵。

目前學界對於思想改造運動的研究現況，參見孫丹於2008年發表的〈建國

¹ 學界對於高校思想改造運動的討論，多以北京、天津地區的經驗為主；譬如：于風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識份子》（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201-208。崔曉麟，《重塑與思考——1951年前後高校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研究》（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56-61，67-74。

² 崔曉麟，《重塑與思考——1951年前後高校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研究》，1。

³ 王德滋主編，《南京大學百年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294-297。

初期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研究述評》⁴，相關學術專著現在並不太多，是尚待開拓的領域，比較重要的有：

一、于風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識份子》：學界一般認為，此書是研究思想改造運動這個領域具有影響力的著作。該書跨越的時間範圍較長，第四章「洗澡運動」直接論及思想改造運動，大量應用知識份子的檢討材料，建立一個較為粗略但宏觀的歷史敘述⁵。書中強調思想改造運動對知識份子群體的心理傷害與負面影響，也是不少學者持有的「傳統」觀點，謝泳〈思想改造運動的起源及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亦是接近這樣的觀點⁶。然而，這種特定視角某種程度上成為深化研究的侷限性，無法更進一步思考這次運動背後的深層意義。

二、崔曉麟《重塑與思考——1951年前後高校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研究》：是第一本以高校知識份子為對象，以思想改造運動為主題的專書。作者認為高校思想改造運動與其他領域思想改造運動的相異之處是，「不僅要確立中國共產黨在高等學校中的領導地位，而且要在黨的領導下進行高等教育改革」，因此，「1952年9月各大區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工作的完成，標誌著高校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的結束」⁷。該書觀點新穎，注意到思想改造運動在高校造成的根本性變化，是本文主要的對話對象。

三、李剛《現代知識群體的話語轉型(1949-1959)》：該書以1950年代知識

⁴ 孫丹，〈建國初期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研究述評〉，《當代中國史研究》15.3(北京，2008.05)，89-96。

⁵ 于風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識份子》，201-267。

⁶ 謝泳，〈思想改造運動的起源及對中國知識份子的影響〉，收入：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中國研究論文庫，
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2058。

⁷ 崔曉麟，《重塑與思考——1951年前後高校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研究》，99。

份子群體的思想、知識、學術轉型作為考察對象⁸，第四章「思想改造運動中的自我批判」引用各種來源的史料，如：中共的歷史文件、當時的報章期刊、當事人的日記、文集等，並大篇幅引用直接史料，可見作者紮實的史料搜集功夫。尤其作者詳細探討高校「思想改造」與中共「組織清理」的關係，這種觀點具有啟發性，有助瞭解思想改造運動在高校的政治意義，這是其他論著較少深入分析的。

本文研究南京大學思想改造運動的史學方法，受到董國強對南大的文化大革命史相關研究啟蒙，諸如：〈從南京大學「倒匡」事件看「文革」的複雜屬性與多重面相〉⁹、〈從南京大學的「清隊」運動看「文革」主要矛盾的轉化及其後果〉¹⁰等論文。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文革」的歷史檔案基本上尚未開放，思想改造運動亦是如此¹¹。只是受限於能力與人脈，筆者無法如同董國強進行當事人的口述歷史訪談，發掘新史料。在史料方面，南大校方對於校史的史料編纂與研究成果算是相當豐碩的，包括：《南京大學校史資料選輯》¹²、《與世紀同行——南京大學百年老新聞(1902-2001)》¹³、三卷本《南大百年實錄》¹⁴等史料彙編，以及《南京大學史》¹⁵、《南京大學百年史》兩本專書，但

⁸ 李剛，《現代知識群體的話語轉型(1949-1959)》(合肥：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07)，1。

⁹ 董國強，〈從南京大學「倒匡」事件看「文革」的複雜屬性與多重面相〉，《二十一世紀》網路版54(香港，2006.09)。

¹⁰ 董國強，〈從南京大學的「清隊」運動看「文革」主要矛盾的轉化及其後果〉，《二十一世紀》網路版70(香港，2008.01)。

¹¹ 崔曉麟，《重塑與思考——1951年前後高校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研究》，序。

¹² 南京大學校慶辦公室校史資料編輯組等編，《南京大學校史資料選輯》(南京：南京大學，1982)。

¹³ 方延明主編，《與世紀同行——南京大學百年老新聞(1902-2001)》(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¹⁴ 《南大百年實錄》編輯組編，《南大百年實錄》，上、中、下冊(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在這些直接或間接史料中，思想改造運動的記載非常稀少，歷史面貌仍是相當模糊的。

在歷史檔案尚未開放的前提下，本文以現有公開的各種史料為主。需要說明的是，南大出版的兩本校史專書，根據合理的推斷，應有參考南京大學檔案館的檔案。另外，中共南京市委黨史辦公室編《春風七年金陵路——1949年至1956年南京黨史專題研究》，收入〈南京市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一文¹⁶，論及南大的情況，直接註明引用南京市檔案館的檔案，上述兩個檔案館應有保存南大思想改造運動的相關檔案。在無法見到直接史料的情況下，這兩本專書與一篇論文，成為價值最高的間接史料。雖然現在無法盡知當時運動的細節，但透過相對細密的史料考證功夫，大致能瞭解這次政治運動的過程，必要時，將引用其他地方思想改造運動的史料，作為深化討論的佐證。有關「思想改造」與「組織清理」的關係，現有公開的南大史料幾乎沒有涉及，需要從中共有關文件著手。除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兩部中共史料彙編，江蘇省檔案館藏的中共蘇北區黨委宣傳部印《思想改造與組織清理工作文件》，內有1951至52年有關學校思想改造運動的指示與報告，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

二、思想改造運動的背景與過程

南京大學的思想改造運動，作為一種政治運動，發生自1952年3月，僅歷時數月，但它有一個比較漫長而細緻的醞釀與發動過程，其背景仍要從「解放」初期的政治學習運動開始談起。

¹⁵ 南京大學校史編寫組，《南京大學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

¹⁶ 南京醫學院社科部，〈南京市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收入：中共南京市委黨史辦公室編，《春風七年金陵路——1949年至1956年南京黨史專題研究》（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1990），278-291。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根據研究，此時中央大學的中共黨員人數約242人，外圍組織「新民主主義青年社」成員接近300人¹⁷。從現有史料來看，中央大學在「解放」後、接管前的過渡時期，曾組織過政治學習活動；5月5日，中央大學應變會主持學習週第一次座談會，以「新民主主義」為題訂定討論大綱，包括「新民主主義」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特徵、以及「舊三民主義」與「新三民主義」的區別、「中國往何處去」等，基本上是參考毛澤東1940年的〈新民主主義論〉¹⁸。5月7日，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通知：中央大學由中國人民解放軍接管，趙卓任軍事代表，並組成中央大學接管工作組¹⁹。5月25日，在該學期第五次教授大會會議上，軍事代表趙卓表示：「我願以學習態度，向各位先生學習，希望各位先生多多指教」。中央大學教授會常務理事梁希教授則說：「我們為學習毛澤東思想、馬列主義，我們應向明瞭主義、徹底革命的軍事代表學習」²⁰。8月8日，國立中央大學改名為國立南京大學²¹。同年下學期，取消若干所謂的「反動課程」，增加全校共同必修的政治課程，但此時尚未進行整體的課程改革；因此，「從舊的中大到新的南大，除了在形式上有所改變以外，內容還是原封未動」²²。

¹⁷ 華彬清等主編，《南京大學共產黨人(1922年9月-1949年4月)》(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60。

¹⁸ 〈中大應變會主持學習週第一次座談會〉(1949年5月5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中央大學檔案》，案卷號：1013，「中大應變委員會工作總結報告(1949年6月)」。

¹⁹ 南京大學高教研究所編，《南京大學大事記(1902-1988)》(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9)，83。

²⁰ 〈三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五次教授大會會議紀錄〉(1949年5月25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中央大學檔案》，案卷號：972，「中大教授大會會議錄(1948年)」。

²¹ 南京大學高教研究所編，《南京大學大事記(1902-1988)》，83。

²² 田欣，〈記南京大學的課程改革運動〉，《觀察》6.10(北京，1950.03)，22。

1950年1月28日，南京軍管會高等教育處召集南京市高等教育工作者千餘人，在南大禮堂集會，傳達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決議，指出南京教育改革的中心任務是「開展政治學習運動」與「合理精簡課程」，南大的寒假學習也就以「加強政治學習」和「精簡課程」為重點²³。3月，全校師生以一個月時間的進行思想政治教育，並成立政治教學委員會，主任委員是時任南京軍管會高教處副處長兼南京大學軍代表的孫叔平，以及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潘菽²⁴。值得觀察的是，潘菽是九三學社的重要領導人物；這是中國共產黨在尚未鞏固在高校領導地位的階段，結合民主黨派教授進行政治學習的嘗試。這次政治學習的方法是「聽大課，讀文件，小組漫談、討論，小組或合組進行辯論」，並創造一些新的學習形式，如「留學制」、「點將、挑戰」、「問題宴會」等²⁵。總體來說，這個階段的政治學習是「自發而鬆散的」²⁶。1950年10月，根據教育部通知，各級學校校名之前不加「國立」字樣，故稱南京大學²⁷。

根據南大教師王覺非在《逝者如斯》的回憶：「剛解放時的學習形式和內容都比較簡單……這時在方式、方法上也採用了一些新花樣……這種方式本身就反映了政治學習還處於被動、膚淺的階段……但是到1952年3月，根據華東教育部的規定，各校師生員工正式開始進行思想改造運動時，形勢就突然緊張起來。」²⁸依照華東局關於思想改造的部署，1951年12月23日，南京市政府與市協商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成立南京市毛澤東思想學習委員會(簡稱「市學委」)，作為全市思想改造運動的領導機構。1952年1月5日，市學委決定思想改

²³ 田欣，〈記南京大學的課程改革運動〉，《觀察》，22。

²⁴ 王德滋主編，《南京大學百年史》，294。

²⁵ 王德滋主編，《南京大學百年史》，294-295。

²⁶ 崔曉麟，《重塑與思考——1951年前後高校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研究》，106-107。

²⁷ 南京大學高教研究所編，《南京大學大事記(1902-1988)》，89。

²⁸ 王覺非，《逝者如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273。

造運動重點放在高校和科學界，同時成立市學委高等教育界分會，以領導高教界的思想改造，主任委員潘菽。接著，高等教育界分會決定以南京大學、金陵大學為重點，要求寒假前制訂學習計劃，建立學習組織，寒假中培訓學習骨幹，提出教師思想情況的具體材料²⁹。1月26日，南大秘書室發出「為決定關於開展思想改造學習運動施行辦法的通知」³⁰。但隨著「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在全國的推行，市委指示，學校也展開三反運動。2月1日，市學委決定思想改造學習計畫暫緩實行³¹。三反運動告一段落後，3月22日，南大進行思想改造運動³²。7月15日，南大的學習運動結束，並總結經驗³³。

崔曉麟指出，中共把高校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結合政治學習運動、社會實踐運動(如：土地改革運動、抗美援朝運動)、思想批判運動以及忠誠老實運動，「大運動套著小運動」，呈現「層次遞進又互為交叉的特點」³⁴；所以，高校的三反運動與思想改造運動有其關聯性。根據1952年3月13日〈中共中央關於在高等學校中進行「三反」運動的指示〉：「高等學校中的『三反』運動是極其具體、深刻和有效的思想改造運動」³⁵，譬如每個人都要接受「洗

²⁹ 南京醫學院社科部，〈南京市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春風七年金陵路——1949年至1956年南京黨史專題研究》，280。

³⁰ 〈秘書室關於思想改造學習運動施行辦法的緊急通知〉(1952年1月26日)；收入：南京大學校慶辦公室校史資料編輯組編，《南京大學校史資料選輯》，553-555。

³¹ 南京醫學院社科部，〈南京市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春風七年金陵路——1949年至1956年南京黨史專題研究》，280。

³² 南京大學高教研究所編，《南京大學大事記(1902-1988)》，91。

³³ 南京醫學院社科部，〈南京市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春風七年金陵路——1949年至1956年南京黨史專題研究》，280。

³⁴ 崔曉麟，《重塑與思考——1951年前後高校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研究》，169。

³⁵ 〈中共中央關於在高等學校中進行「三反」運動的指示〉(1952年3月13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117。

澡過關」的考驗，正是三反運動興起後開始的要求³⁶，並延續至思想改造運動。南大的思想改造運動，相對於京津地區高校思想改造運動是比較晚的，是在發動三反運動後才具體展開的，這使得南大的思想改造運動與三反運動在時間點上，似乎有一部分的交集；當時任職南大的施廷鏞在三反運動，被「收繳」兩千多枚收藏多年的珍稀古錢幣，根據其「貪污贓物繳還憑證」，「繳贓」日期為當年3月28日³⁷，理論上是南大思想改造運動開始的第七天。

南大思想改造運動發生在1952年3月到7月間，其過程有幾種不同來源的觀點：

一、《南京大學百年史》的官方說法：「學習運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學習文件，劃清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界限；第二階段採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進行個人檢查對照；第三階段為思想總結。」³⁸

二、《南京大學大事記(1902-1988)》的記載：「全校師生員工3,700餘人參加，全部學習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學習文件，劃清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界限；第二階段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進行個人檢查，做到人人『洗澡』；第三階段總結。校、院、系三級成立學習委員會，加強領導。校學習委員會主任潘菽，副主任孫叔平。」³⁹

三、中共南京市委黨史辦公室編《春風七年金陵路——1949年至1956年南京黨史專題研究》：「一般說來，每個單位的思想改造都經過了三個階段：1. 學習文件，動員和端正學習態度；2. 全面思想檢查；3. 組織清理。學習方法也大致採用：精讀文件，聽取報告，領導帶頭聯繫實際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

³⁶ 于風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識份子》，208。

³⁷ 圖69，沒收憑據，收入：施銳，《奮鬥一生——紀念施廷鏞先生》（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120。

³⁸ 王德滋主編，《南京大學百年史》，296。

³⁹ 南京大學高教研究所編，《南京大學大事記(1902-1988)》，91。

四、王覺非在《逝者如斯》的回憶：「運動開展後，先學習文件，然後進行個別檢查，『個個洗澡』，在全校還舉辦了一個思想改造的展覽，把教師中『醜惡』的東西公之於眾。」⁴¹

比較這四種來源的史料，基本上第一階段都是「學習文件」，較無疑義。南大思想改造運動學習文件的內容，目前未見直接史料可以說明，僅知包括「中國革命史」、「社會發展史」等，讓他們「了解黨對知識份子的政策，認識思想改造的意義」⁴²。

1951年9月展開的京津地區高校教師思想改造運動，具有指標意義，亦是其他地區高校思想改造運動的重要範本，當時的學習文件以毛澤東的相關文件比較多，包括〈整頓學風黨風文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改造我們的學習〉等，還有列寧、史達林、劉少奇等人的文件⁴³。根據合理的推論，南大思想改造運動的學習文件，可能大致以這些文件為主，或根據個別情況指定其他的補充文件，透過逐字逐句閱讀文件，使師生「逐步熟悉了一套幾乎是全新的思想觀念和思維用語」⁴⁴。另外，南大當時收集1,500餘件材料，包含舊檔案、個人著作、論文和實物，舉辦思想展覽會⁴⁵，「著重說明舊中央大

⁴⁰ 南京醫學院社科部，〈南京市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春風七年金陵路——1949年至1956年南京黨史專題研究》，281。

⁴¹ 王覺非，《逝者如斯》，273。

⁴² 南京醫學院社科部，〈南京市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春風七年金陵路——1949年至1956年南京黨史專題研究》，281。

⁴³ 〈中央關於京津高等學校教師思想改造學習的主要情況和經驗的通報〉，《宣傳通訊》，1951年11月20日。轉引自：李剛，《現代知識群體的話語轉型(1949-1959)》，86-87。

⁴⁴ 李剛，《現代知識群體的話語轉型(1949-1959)》，138。

⁴⁵ 南京醫學院社科部，〈南京市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春風七年金陵路——1949年至1956年南京黨史專題研究》，282。

學長期受封建、買辦、法西斯思想的影響，而不是什麼『清高學府』」。潘菽在1950年就表示：「不久以前在四牌樓和丁家橋頗瀟灑著一種悲觀的空氣，有不少先生和同學覺得南大的前途有了問題，甚至認為南大是在沒落中」⁴⁶。這顯示當時校園氣氛的微妙變化，在「解放」以後，不少師生感覺南京大學不再有原中央大學的「首都大學」光環。

第二階段是「個人檢查」，也就是針對個人的「思想檢查」，當時被形容為「洗澡下樓」⁴⁷，特色是「交代歷史應先從黨、團員開始，動員黨團員帶頭，樹立模範然後推及黨外」⁴⁸。在南大，校學習委員會主任潘菽與副主任孫叔平，帶頭在公開場合進行典型報告，潘菽是「第一個在全校大會上作檢查，交代個人歷史和社會關係，剖析自己思想發展的過程」⁴⁹；而孫叔平在全校教師會議上作「我的思想改造過程」報告，把自己的思想過程向全校彙報⁵⁰。

在這個階段，「要求每人結合自己的經歷，對自己的錯誤思想展開批判。在做法上，個人各自收集整理材料，撰寫提綱，在不同的場合進行思想檢查，並聽取群眾的評議」⁵¹。現有思想改造運動的研究成果，對於所謂「錯誤思想」

⁴⁶ 潘菽，〈談談南大的前途〉，《南大生活》31(1950)，收入：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等編，《潘菽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409。

⁴⁷ 陸渝蓉，〈半個世紀的情和愛——回憶我在南大的學習生活〉，收入：高澎主編，《永恆的魅力——校友回憶文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313。

⁴⁸ 〈中央關於在高等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與清理中層工作的指示〉(1952年5月)，江蘇省檔案館藏，中共蘇北區黨委宣傳部印《思想改造與組織清理工作文件》，8。該指示同〈中共中央關於在高等學校中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和清理「中層」的指示〉(1952年5月2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三冊》，174-178。

⁴⁹ 管致中，〈南京大學初期時的潘菽先生〉，《心理學動態》5.3(北京，1997)，14。

⁵⁰ 張錫金，〈哲學家孫叔平的人生之路〉，《鐘山風雨》2003.1(南京)，16。

⁵¹ 南京醫學院社科部，〈南京市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春風七年金陵路——1949年至1956年南京黨史專題研究》，282。

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已有相當詳細的論述⁵²。南大教師大多原在所謂「首都大學」的中央大學任教，在「解放」以前可能與國民黨政權有些關聯，因而成為思想檢查的重點。例如南大數學系主任葉南薰的自我批評：「國民黨(當時)正在派員留學，加入國民黨有留學希望，我就託他介紹加入。我的思想與反動派是一致的，看不出它的反動本質」⁵³。又如南大經濟系主任朱傑的自我批評：「1939年10月……竟然投身於反動派統治中最腐敗的財政部中……我以一個大學教授，竟然喪心病狂，到這樣一個臭名昭著的機關去做『簡任秘書』」⁵⁴。這類發表在報刊上的自我批評，有學人歸納為「挖掘舊我——全盤否定舊我——宣誓與舊我決裂、塑造新我」的「三段式」檢討，往往是千篇一律的固定模式⁵⁵。經過這樣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再根據其「歷史和思想表現」，把這些知識份子劃分成不同類型，採取不同的「幫助措施」，輕者「事先幫助他們徵求群眾意見，使他們的檢查能為群眾所滿意，一般在小範圍內通過」，其次是「在院系或全校的大會上檢查，組織批判，以批判思想為主，一般不追歷史政治問題」，重者則「帶有鬥爭的氣氛，檢查不好則不能通過，以便轉入組織處理」⁵⁶。

思想改造運動不只是自上而下發動的政治運動，往往牽扯到組織內部的人事紛爭。以南大教師胡小石為例，他屬於老一輩的學者，以當時的政治眼光來

⁵² 譬如：李剛，《現代知識群體的話語轉型(1949-1959)》，108-138。

⁵³ 葉南薰，〈初步檢查我的政治思想〉，《教師們的思想改造》(上海：華東人民出版社，1952)，81-90。轉引自：李剛，《現代知識群體的話語轉型(1949-1959)》，112-113。

⁵⁴ 朱傑，〈批判我的資產階級思想〉，《教師們的思想改造》，56-58。轉引自：李剛，《現代知識群體的話語轉型(1949-1959)》，123-124。

⁵⁵ 笑蜀，〈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說微〉，《文史精華》147(石家莊，2002.08)，39-40。

⁵⁶ 南京醫學院社科部，〈南京市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春風七年金陵路——1949年至1956年南京黨史專題研究》，282-283。

看，理應屬於所謂的「封建學者」，但因胡小石在「解放」前即支持學生運動，「護校有功」，因此在「解放」初期受到中共相當程度的尊重。胡小石曾任中央大學中文系主任與文學院院長，中文系有些中生代教師還是他的學生，但「他們與師輩在學術上水平懸殊，一時又得不到開課的機會」，甚至有教師公開「要求讓課給他」。而在思想改造運動時，胡小石受到直接無情的攻訐，一位學生輩的年輕教師說：「國民黨政府打算任命小石師為中央大學校長時，小石師雖然嚴詞拒絕了，但內心可能還是高興的」⁵⁷。這樣捕風捉影的誅心之論，可見當時思想改造運動的肅殺氣氛。

《南京大學百年史》稱第三階段是「思想總結」，思想總結的方法是「先由本人寫一書面檢查，交由小組評定，接受同事、群眾包括學生們的激烈批評，經過反覆檢討、反覆修改後通過」⁵⁸。《春風七年金陵路——1949年至1956年南京黨史專題研究》直接稱此階段是「組織清理」，這是理解高校思想改造運動的關鍵，將在下一節專門討論。

三、思想改造與組織清理的關係

中共中央對思想改造運動從一開始就有明確指示，「運動的落腳點必須是在組織清理這一點上」，以確保中共在各級學校的政治領導地位，這表示學校的思想改造運動與中共的組織清理工作有密切關係，而中共對於組織清理採取「先黨內後黨外，先試行後推廣」，謹慎推行⁵⁹。目前公開的南大相關史料，難以窺見思想改造與組織清理的關係，因此需要從中共有關文件找尋線索；首先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的相關文獻，可以理解「組織清理」自外而內的

⁵⁷ 周勛初，〈我所了解的胡小石先生〉，收入：許志英主編，《學府隨筆：南大卷》（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7），268-270。

⁵⁸ 于風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識份子》，34。

⁵⁹ 崔曉麟，《重塑與思考——1951年前後高校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研究》，79。

時間順序。根據1951年4月2日的毛澤東批語，此時鎮壓反革命的重點仍在「外層」⁶⁰。同年5月15日，開始解決清理「中層」的問題，包括組織學習、登記坦白和分別處理等三階段，在「分別處理」的階段，是指「根據原有材料、新的材料組織審查，分清問題的性質與大小，適當加以處理。對坦白者一般不應逮捕」⁶¹。5月21日，中共中央指示要求在當年夏秋兩季，開展清理「中層」與「內層」⁶²。

中共在高校進行組織清理的時程，相對是比較晚的。先在其他黨、政、軍等組織進行清理「中層」、「內層」，以及在革命大學進行「忠誠老實政治自覺」運動，再選擇一、兩所高校試點進行，累積一定經驗後，才推廣到全國其他高校⁶³。從中共中央於1951年11月發出的〈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可知，此時在學校推動的思想改造運動是「初步的」，有其目的：其政治目的是「清理其中的反革命份子」；其教育目的是「準備學校教育改革」，包含學制改革、院系改革、課程改革、組織改革等⁶⁴，與崔曉麟強調高校思想改造與院系調整的關係，互相呼應⁶⁵。高校思想改造運動具有政治與教育的雙重面向，最終「使全國學校都掌握在黨的領導之下，並逐步取得與保持革命的純潔性」。

⁶⁰ 〈轉發饒漱石關於鎮反中清理外中內三層等問題的報告的批語〉(1951年4月2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215。

⁶¹ 〈轉發蘇南區黨委關於清理「中層」計劃的批語〉(1951年5月15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287-288。

⁶² 〈中央關於印發清理「中層」、「內層」問題的指示的通知〉(1951年5月21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319。

⁶³ 崔曉麟，《重塑與思考——1951年前後高校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研究》，79。

⁶⁴ 〈中央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1951年11月)，江蘇省檔案館藏，中共蘇北區黨委宣傳部印《思想改造與組織清理工作文件》，2。

⁶⁵ 崔曉麟，《重塑與思考——1951年前後高校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研究》，99。

組織清理工作，牽涉到組織內的個人去留問題，嚴重者甚至會遭到逮捕，因此處理不好的話，容易產生糾紛，甚至「引起了教職員、學生和學生家長對黨和人民政府的對立情緒」⁶⁶，因此「防止偏向」成爲在思想改造運動中，進行組織清理的重要課題。中共中央於1952年5月發出的〈中央關於在高等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與清理中層工作的指示〉⁶⁷，是有關高校思想改造運動的重要文件，從中可以直確認思想改造與清理中層的緊密關係，以及觀察中共在運動中細膩的政治操作，避免失控。此時，中共在高校的領導地位尚未完全穩固，無法採取強制方式。因此，「不追不逼，啓發自覺的原則」，成爲推行運動的關鍵。舉例來說，「以前南大數學系爲森林系增開3小時課，開了兩次會才接受下來，學習後，每周增上94小時的任務，大家爭相報名，很快落實。不少教師在星期天還抽空去輔導成績較差的學生」⁶⁸。這種群眾「爭相報名」的情況，可以想像歷經「學習文件」的階段，組織內的工作氣氛已經大爲轉變。

從1951年5月21日〈中共中央關於清理「中層」、「內層」問題的指示〉顯示：此時中共在組織的領導權威尚未完全建立，必須避免推動組織清理工作的中共黨員，遭到多數群眾的集結反對而陷入孤立。在組織進行清理工作時，「必須有黨外人士參加此種清查工作委員會」，「避免由共產黨員孤立地去做」⁶⁹。在南大的組織清理階段，「要求每人填寫『政治歷史年表』，忠誠老實地

⁶⁶ 〈中央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1951年11月)，江蘇省檔案館藏，中共蘇北區黨委宣傳部印《思想改造與組織清理工作文件》，5。

⁶⁷ 〈中央關於在高等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與清理中層工作的指示〉(1952年5月)，江蘇省檔案館藏，中共蘇北區黨委宣傳部印《思想改造與組織清理工作文件》，6-9。

⁶⁸ 南京醫學院社科部，〈南京市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春風七年金陵路——1949年至1956年南京黨史專題研究》，285。

⁶⁹ 〈中共中央關於清理「中層」、「內層」問題的指示〉(1951年5月21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275。

交清自己的歷史並檢舉揭發反革命份子，最後由組織作出適當的結論，以安其心。個人歷史問題的審查由學委組織專門力量進行」⁷⁰。需要補充的是，邵燕祥在1951年參與廣播事業局的「忠誠老實政治自覺」學習運動，留有〈自傳及交代材料提綱〉⁷¹，是很有歷史價值的直接材料，也是學界經常引用與討論的史料，對於理解南大的「政治歷史年表」，應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根據北京和上海兩地的經驗，高校思想改造運動運動有「過關」比例的設定：「應該讓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教師，在作了必要的自我檢討以後迅速過關。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五的教師，是要經過適當批評以後再行過關；百分之十三左右的教師，是要經過反覆的批評檢討以後始予過關；只有百分之二左右是不能過關，需要作適當處理。這樣的比例大體上是合適的」⁷²。目前現有公開的南大史料，沒有這方面的記載，但根據合理的判斷，這樣的過關比例很可能適用於南大。透過組織內過關比例的調控，半數以上的教師「作了必要的自我檢討以後迅速過關」，少數教師「經過適當批評以後再行過關」或「經過反覆的批評檢討以後始予過關」，只有極少數教師「不能過關」。把教師劃分成不同等級的群體，透過不同程度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各有不同難度的「過關」方式，並透過打擊極少數「不能過關」的教師，達到殺雞儆猴的震懾效果，逐步建立中共在高校的權威地位。另一方面，這種「分而治之」的過關比例，多數教師基於本身的立場與利益，不容易串聯集結，威脅到中共在高校尚未完全穩固的領導地位。

⁷⁰ 南京醫學院社科部，〈南京市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春風七年金陵路——1949年至1956年南京黨史專題研究》，283。

⁷¹ 邵燕祥，〈自傳及交代材料提綱〉，《天涯》2000.1(海口)，48-50。

⁷² 〈中央關於在高等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與清理中層工作的指示〉(1952年5月)，江蘇省檔案館藏，中共蘇北區黨委宣傳部印《思想改造與組織清理工作文件》，6-7。

四、高校政治工作制度的建立

隨著三反運動、思想改造運動和清理中層工作的推展，中共開始把這些政治運動的成果，予以固定化與常態化，因為「學校中黨的威信大大地提高了」，需要進一步考慮在高等學校中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和機構」，以便加強中共的領導作用，並在這樣的基礎上，「貫徹高等教育的改革」。這裡所謂的「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和機構」，具體來說，是首先選擇少數幾所條件較好的學校，把執行清理中層工作的校內機構(一般稱為學習委員會辦公室)，將之轉變為屬於「學校行政系統之內的經常性的政治工作機構」，機構名稱暫時為「政治輔導員辦公室」，日後則發展為「政治輔導處」。它的任務是「管理全校的政治工作，包括領導思想學習，掌握教師學生政治情況，歷史材料，主持畢業學生政治鑑定，領導全校教職員工社會活動等」，並「試行建立政治輔導員制度」。另外，在清理中層工作完畢以後，應該「在教師中開始建立有系統的政治理論學習」⁷³。1952年9月2日，中共中央轉發中央教育部黨組〈關於在高等學校試行政治工作制度的報告〉：「全國高等學校在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以後，應有準備地在校內設立政治工作機構，其名稱可稱為政治輔導處。」⁷⁴

有意思的是，在現有公開的南大史料，幾乎沒有組織清理的記載，但卻無意留下建置政治工作制度的線索。高校的思想改造運動之後，緊接著高校的院系調整，本文不擬探討南大院系調整的細節，在此僅指出，兩者確實有時間順序上的密切關係，並使得南大政治工作制度的建立，增加其複雜性。1952年7

⁷³ 〈中央關於在高等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與清理中層工作的指示〉(1952年5月)，江蘇省檔案館藏，中共蘇北區黨委宣傳部印《思想改造與組織清理工作文件》，8-9。

⁷⁴ 〈中共中央轉發中央教育部黨組《關於在高等學校試行政治工作制度的報告》〉(1952年9月2日)，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三冊》，321。

月至9月，南京大學與金陵大學兩校合併，成立以文理科為主的綜合大學，仍名「南京大學」，並進行相關院系的合併、遷移，以及新設高校的組建工程，相當繁雜卻又迅速完成⁷⁵。10月28日，教育部發出指示：在高等學校重點試行政治工作制度，設立政治輔導處⁷⁶。12月5日，華東軍政委員會教育部通知南大：「經我部決定報請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任命汪大年為你校政治輔導處主任」⁷⁷。而12月9日製的〈南京大學組織系統表〉顯示，政治輔導處下設組織、青年、宣教三科⁷⁸。

高校在思想改造運動之後，院系調整隨之而來，無論是前者的大規模政治運動，或是後者的大規模組織重整，對於高校師生都是很大的變動過程，不可避免地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亂現象」。在〈南京大學1952年度工作報告〉有很大篇幅是這方面的檢討：南京高校院系調整是在當年9月中旬完成的，10月1日開學，新生於10月中旬到校，「當時學校物質困難很大，教室、實驗室、寢室、飯廳、廁所，什麼都不夠。在東拼西湊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又匆匆促促建立了機關(教務、政治、總務處)」，而若干按照「『指導志願』分配來校的學生不安心學習，任意曠課，破壞紀律的現象也發展到相當嚴重」。這種混亂現象同樣出現在南大剛建立的政治工作制度；由於「有些機構新建立及原有的組織不健全，各科對於本科任務及各科間的職責分工在某些方面還不夠明確」，所

⁷⁵ 王德滋主編，《南京大學百年史》，301-310。胡建華，《現代中國大學制度的原點：50年代初期的大學改革》(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100-102。

⁷⁶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4)，67。

⁷⁷ 〈華東軍政委員會教育部關於我校正、副校長及政治輔導處主任先行到職的通知〉(1952年12月5日)，收入：《南大百年實錄》編輯組編，《南大百年實錄(下卷)：南京大學史料選》，44。

⁷⁸ 〈南京大學組織系統表〉(1952年12月9日)，收入：《南大百年實錄》編輯組編，《南大百年實錄(下卷)：南京大學史料選》，45。

以「一年以來的工作存在著不少混亂現象」。以政治輔導處青年科為例，「不該做的也做了」，譬如新生入學報到工作、入學人數及學生各種成分統計、入學後證件的審查、學生生病請求接洽治療、學籍問題的處理、學生作息時間的安排等，這些業務與教務處註冊科、總務處保健科「分工不清」，導致青年科「多忙於這些工作及學生資料的整理工作」，而「對於學生應做的思想領導及生活、政治等方面工作，就做得不夠深入細緻」⁷⁹。所以，不宜過度高估此時高校政治工作制度的落實程度。

五、結語

高校的思想改造運動，作為一種政治運動，僅歷時數月，但它有一個比較漫長而細緻的醞釀與發動過程，其背景仍要從「解放」初期的政治學習運動理解，並與三反運動牽涉甚深。在政治上，是為推展中共的清理中層工作；在教育上，則是作為院系調整等教育改革的準備。綜合來說，則是為鞏固中共在全國高校的領導地位。

雖然1952年9月24日的《人民日報》社論指出：「今天的院系調整工作，是在學校的政治改革和教師的思想改造已經取得重大勝利的基礎上進行的」，易言之，高校的思想改造運動，確實有助於消除高校師生對院系調整的抗拒與反對。以南大與金大的合併為例，「絕大多數人都能愉快地服從調動，即或少數人思想上略有波動，便立即得到其他同志的幫助，做到百分之百地服從分配」，「僅二十天就大致完成系科準備和調整方案，開始搬遷工作。在校舍、儀器的分配上，都做到有原則的『揖讓』。經過兩個月的緊張工作，設立在南京的八所高校的院系調整工作就勝利結束了」⁸⁰。王覺非也表示：「這次院系

⁷⁹ 〈南京大學1952年度工作報告(節選)〉，收入：《南大百年實錄》編輯組編，《南大百年實錄(下卷)：南京大學史料選》，56-58。

⁸⁰ 南京醫學院社科部，〈南京市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春風七年金陵路—

調整非常順利，不但各方面的工作按照領導意圖一一進行，而且全體師生員工都一致擁護，沒有發生拒不執行、發牢騷、埋怨等事」，原因是「解放後幾次政治運動，特別是思想改造運動已使廣大群眾不敢對領導的安排稍有異議，更不敢公開表示不滿和反抗」⁸¹。但嚴格來說，「院系調整」不見得是高校思想改造運動的主要目的，也不代表高校思想改造運動的結束，按照本文有關「思想改造」與「組織清理」兩者關係的討論，可以發現高校思想改造運動重要的最後一步，應該是「政治工作制度的建立」。

如果以中共的價值觀與意識形態作為標準，高校思想改造運動可說是一次「成功的」政治運動⁸²，雖然有些粗暴、過火的地方，比如生物系某教師對蚯蚓的研究，園藝系某教師對《紅樓夢》中大觀園園林藝術的研究，被任意扣上「資產階級」的帽子加以批判⁸³。但高校思想改造運動沒有出現運動方向失控的「偏向」問題，基本上達到原本預期的要求與目標。以南京大學為例，透過政治輔導處的設立，下設組織、青年、宣教三科，以及政治輔導員的設置，掌握全校師生的政治學習與思想情況，並管理歷史、政治材料，把思想改造運動的兩大重心—政治學習與思想檢查，加以制度化與常態化，短期內雖然出現某種程度的混亂現象，其長遠結果是增強中共在高校的領導地位與控制能力，也為日後更大規模、更大程度的政治運動留下伏筆。

— 1949年至1956年南京黨史專題研究》，286。

⁸¹ 王覺非，《逝者如斯》，276。

⁸² 謝泳表示：「思想改造運動，從設計者角度考慮，這個運動是很成功的，不過它越是成功，對中國知識份子的傷害就越大」。參見：謝泳，〈思想改造運動的起源及對中國知識份子的影響〉。

⁸³ 王德滋主編，《南京大學百年史》，296-297。

參考書目 Bibliography

一、檔案

1. 〈三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五次教授大會會議紀錄〉(1949年5月25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中央大學檔案》，案卷號：972，「中大教授大會會議紀錄(1948年)」。
“Sanshiqi xueniandu dierxueqi diwuci jiaoshou dahui huiyi jilu” (25 May, 1949), The 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Zhongyang daxue dangan*, File No. 972: *Zhongda jiaoshou dahui huiyilu*(1948).
2. 〈中大應變會主持學習週第一次座談會〉(1949年5月5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中央大學檔案》，案卷號：1013，「中大應變委員會工作總結報告(1949年6月)」。
“Zhongda yingbianhui zhuchi xuexizhou diyici zuotanhui” 5 May, 1949), The Second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Zhongyang daxue dangan*, File No. 1013: *Zhongda yingbian weiyuanhui gongzuo zongjie baogao*(June, 1949).
3. 江蘇省檔案館藏，中共蘇北區黨委宣傳部印《思想改造與組織清理工作文件》。
Jiangsu Provincial Archives, *Zhonggong subei qu dangwei xuanchuanbu yin*, *Sixiang gaizao yu zuzhi qingli gongzuo wenjian*.

二、專書

1. 《南大百年實錄》編輯組編，《南大百年實錄》(上、中、下冊)，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Nanda bainian shilu bianjizhu bian. *Nanda bainian shilu*(vol. 1-3).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2.
2. 于風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識份子》，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Yu, Fengzheng. *Gaizao: 1949-1957 nian de zhishifenzi*. Zhengzhou: Henan People Press, 2001.

3.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4。

China 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bian. *Zhonghua renming gonghequo jiaoyu dashiji*. Beijing: Education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1984.

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Central Party Literature Research Office bian. *Jianguo yilai Mao Zedong wengao*, vol. 2. Beijing: Central Party Literature Press, 1997.

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Central Party Literature Research Office bian. *Jianguo yilai zhongyao wenxian xuanbian*, vol. 2. Beijing: Central Party Literature Press, 1997.

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7. Central Party Literature Research Office bian. *Jianguo yilai zhongyao wenxian xuanbian*, vol. 3. Beijing: Central Party Literature Press, 1997.

8. 中共南京市委黨史辦公室編，《春風七年金陵路——1949年至1956年南京黨史專題研究》，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1990。

Zhonggong nanjingshiwei dangshi bangongshi bian. *Chunfeng qinian jinlinglu: 1949-1956 nian nanjing dangshi zhuanji yanjiu*. Nanjing: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1990.

9. 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等編，《潘菽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7。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dengbian. *Pansu quanji*, vol.

8. Beijing: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2007.

10. 方延明主編，《與世紀同行——南京大學百年老新聞(1902-2001)》，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Fang, Yanming zhubian. *Yu shiji tongxing: nanjing daxue bainian laoxinwen(1902-2001)*.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2.

11. 王覺非，《逝者如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

Wang, Juefei. *Shizhe rusi*. Beijing: China Youth Press, 2001.

12. 李剛，《現代知識群體的話語轉型(1949-1959)》，合肥：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07。

Li, Gang. *Xiandai zhishi qunti de huayu zhuanxing(1949-1959)*. Hefei: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2007.

13. 南京大學校史編寫組，《南京大學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

Nanjing daxue xiaoshi bianxiezu. *Nanjing daxueshi*.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1992.

14. 南京大學校慶辦公室校史資料編輯組等編，《南京大學校史資料選輯》，南京：南京大學，1982。

Nanjing daxue xiaoqing bangongshi xiaoshi ziliao bianjizu dengbian. *Nanjing daxue xiaoshi ziliao xuanji*.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1982.

15. 南京大學高教研究所編，《南京大學大事記(1902-1988)》，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89。

Nanjing daxue gaojiao yanjiusuo bian. *Nanjing daxue dashiji(1902-1988)*.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1989.

16. 施銳，《奮鬥一生——紀念施廷鏞先生》，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
Shi, Rui. *Fendou yisheng: jinian Si Tingyong xiansheng*.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17. 胡建華，《現代中國大學制度的原點：50年代初期的大學改革》，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Hu, Jianhua. *Xiandai zhongguo daxue zhidu de yuandian: 50 niandai chuqi de daxue gaige*. Nanjing: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1.
18. 高澎主編，《永恆的魅力——校友回憶文集》，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Gao, Peng zhubian. *Yongheng de meili: xiaoyou huiyi wenji*.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2.
19. 崔曉麟，《重塑與思考——1951年前後高校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研究》，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
Cui, Xiaoling. *Chongsu yu sikao: 1951 nian qianhou gaoxiao zhishi fenzi sixiang gaizao yundong*. Beijing: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istory Publishing House, 2005.
20. 許志英主編，《學府隨筆：南大卷》，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7。
Xu, Zhiying zhubian. *Xuefu suibi: nanda juan*. Jinan: Shandong Wenyi Press, 2007.
21. 華彬清等主編，《南京大學共產黨人(1922年9月-1949年4月)》，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Hua, Binqing deng zhubian. *Nanjing daxue gongchandangren(September, 1922-April, 1949)*.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2.

三、期刊論文

1. 田欣，〈記南京大學的課程改革運動〉，《觀察》6.10(1950.03)，22-23。

- Tien, Xin. "Ji nanjing daxue de kecheng gaige yundong," *Guancha* 6.10(1950.03), 22-23.
2. 邵燕祥，〈自傳及交代材料提綱〉，《天涯》2000.1(2000)，48-50。
- Shao, Yienxiang. "Zizuan ji jiaodai cailiao tigang" *Frontiers* 2000.1(2000), 48-50.
3. 孫丹，〈建國初期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研究述評〉，《當代中國史研究》15.3(2008.05)，89-96。
- Sun, Dan. "Jianguo chu qi zhishi fenzi sixiang gaizao yundong yanjiu shuping," *Contemporary China History Studies* 15.3(2008.05), 89-96.
4. 笑蜀，〈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說微〉，《文史精華》147(2002.08)，36-50。
- Xiao, Shu. "Zhishi fenzi sixiang gaizao yundong shouwei," *Gems of Culture and History* 147(2002.08), 36-50.
5. 張錫金，〈哲學家孫叔平的人生之路〉，《鐘山風雨》2003.1(2003)，15-19。
- Zhang, Xijin. "Zhhexuejia Sun Shuping de rensheng zhi lu," *Zhongshan Fengyu* 2003.1(2003), 15-19.
6. 董國強，〈從南京大學「倒匡」事件看「文革」的複雜屬性與多重面相〉，《二十一世紀》網路版54(2006.09)。
- Dong, Guoqiang. "Cong nanjing daxue 'daokuang' shijian kan 'wenge' de fuza shuxing yu duochong mianxiang," *Twenty-First Century* 54(2006.09), web version.
7. 董國強，〈從南京大學的「清隊」運動看「文革」主要矛盾的轉化及其後果〉，《二十一世紀》網路版70(2008.01)。
- Dong, Guoqiang. "Cong nanjing daxue 'qingdui' yundong kan 'wenge' zhuyao maodun jiqi houguo," *Twenty-First Century* 70(2008.01), web version.
8. 管致中，〈南京大學初期時的潘菽先生〉，《心理學動態》5.3(1997)，13-14。
- Guan, Zhizhong. "Nanjing daxue chuqishi de Pan Shu xiansheng," *Journal of*

Developments in Psychology 5.3(1997), 13-14.

9. 謝泳，〈思想改造運動的起源及對中國知識份子的影響〉，收入：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中國研究論文庫，

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2058。

Xie, Yong. "Sixiang gaizao yundong de qiyuan ji dui zhongquo zhishi fenzi de yingxiang," in Chinese Research Papers Onlin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2058.

Ideological Remoulding Movement in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with Its Causes and Effects (1949-1952):
A Study Centered on Nanjing University

Tseng, Kuan-Chieh

(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e ideological remoulding movement in the early 50's among intellectuals strongly influenced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during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case of Nanjing University to examine the significances of ideological remoulding movement. First of all,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the historical archives have not yet opened, this study manages to scrutinize this political movement in detail as far as possible. Next, while some scholars have claimed that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higher educational system indicated the end of the ideological remoulding movement in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the author of this study argues that indeed the two events were connected to some extent, but the ideological remoulding movement was more closely related to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organizational purge. Therefore, the last stage of ideological remoulding movement was the establishment of political work system, and in doing so the two aspects of the ideological remoulding movement —— “the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 ideological examination” —— was thus normalized.

Keywords: Ideological remoulding movement in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Nanjing University, Reconstruction of the higher educational system, Organizational purge, Political work system